

施明正和他的白色恐怖經驗文學

彭瑞金／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

施明正（1935～1988），出生於高雄市，其父為高雄名人施闊嘴，開設接骨傷科「診所」。施明正高雄中學畢業後，致力於追求「文學、藝術、推拿」，1962年，因受其四弟施明德「亞細亞聯盟案」牽連，入獄五年。在獄中開始寫作，出獄後投稿《臺灣文藝》。早期的作品高度強調他的唯美主義及自我，像是浸泡在藝術酵素中過久的、有些酸味的文學。他寫詩、寫小說，也作畫，自稱，二十歲以前是「追求完美藝術的年代」。

他在「施明正詩、畫、小說集」，也是他的第一本作品集《魔鬼自畫像》的〈自序〉中寫道：「追求文學、藝術、推拿三十幾年，愈追愈深、愈廣，愈追愈覺人生之苦短，在不斷的追求過程中，我自始就是一個追慕完美的理性主義者，因此，我的詩、畫、小說、推拿，已和我的生活融成一體。我們兄弟的生活，肇始於名醫先父施闊嘴有計畫的擇地、播種、萌芽、成株發葉。」施明正出獄後，肯定做過不少工作，七〇年代初，我第一次遇見他時，他正在龍潭與人合作蓋「販厝」，顯然並不成功，詩、畫、小說，也肯定無助於他的實際生活，只有得自父蔭的「推拿」解決了他作為前政治犯的現實生活問題。八〇年代以前，他在高雄開設「施明正推拿中心」，其後遷居至臺北。

由於熱中於繪畫、推拿，文學作品的產量並不豐富，八〇年代、臺灣文藝雜誌社出版的《魔鬼自畫像》收入〈魔鬼自畫像〉、〈遲來的初戀及其聯想〉等五篇短篇小說及〈與死者的對白〉等十一篇詩作和畫作十二幅，都是早期的作品。後來，雖又出版了《施明正詩、畫集》、《島上愛與死》、《施明正集》等，都屬於舊作的重新整理，增加的作品十分有限。

施明正早期的作品，是以高強度的自我意識和刻意誇張的藝術狂野熱情，顯得與眾不同，但過度的自負和誇張也讓人對他真正的文學成就抱持懷疑的態度，如果不是他在八〇年代有如休火山復發，以截然不同的文學姿態復出文壇，或許世人永遠無法得知他文學的另一面向，也可能永遠無從理解他那以口

吃式的文句、掩飾的真正文學心靈。他的休火山復發告訴世人，「前政治犯」的身分讓他不得不裝魔作鬼去扭曲、變裝、改造自己的文學，不論是如何勇於剖析、表白自己的內在，如何誇張誇示自己的情欲，如何故作叛逆、狂野的唯美主義……無一不是在掩飾他的前政治犯心靈傷痕。他的〈魔鬼自畫像〉不無隱以「魔鬼」自況的意味，但這裡的魔鬼不是指為惡害人的魔鬼，而是指自我扭曲、矛盾、撕裂不成「人」形的魔鬼，是讓狂野與卑懦並存的魔鬼。施明德自承是「天性膽小怕死的人」，其實是被白色恐怖統治手段嚇破膽的前政治犯。從事後（施明正去世後）去觀察，八〇年代施明正的復出，是前政治犯覺悟下的突圍，他不再裝魔作鬼，他以〈喝尿者〉和〈渴死者〉直搗戒嚴時代的文學創作題材禁地。

1962年的「亞細亞聯盟案」，施家兄弟有三人遭到判刑，其中施明德被判處無期徒刑，坐了十五年牢，始因蔣介石去世、獲減刑出獄。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施明德又以首謀叛亂，再度判處無期徒刑。1987年解嚴後，施明德遭囚禁前後合計已逾二十一年，仍不獲平反釋放，是時，綠島亦有囚禁逾三十四年之政治犯未獲釋放，施明德乃在獄中絕食抗議，軍監寧可把他移禁於三軍總醫院的豪華病房、強迫灌食，亦不釋放他。施明正亦在獄外絕食聲援，數月後，於1988年8月22日，引發肺衰竭去世。施明正於美麗島事件後，毅然決定走出白色恐怖牢獄的陰影，重拾文學之筆，開始在鍾肇政主持的《臺灣文藝》等刊物發表了〈遲來的初戀及其聯想〉、〈島嶼上的蟹〉、〈渴死者〉、〈喝尿者〉、〈指導官與我〉等多篇作品，而且都署名「奉獻者施明德大哥施明秀」，施明秀是施明正的另一筆名。當時，很多人都不諒解，一向耽溺於唯美、頹廢的施明正，為什麼一定要去沾施明德的光？施明德1975年出獄後，跑去幫難友蘇東啟的太太蘇洪月嬌競選縣議員，順利當選，並以「許一文」筆名出版《增設中央第四國會芻議》，加上曾被長期囚禁獲釋的政治犯英雄形象，

許多人都認為兄弟二人很難湊在一起。我也曾聽聞過施明德說，他出獄後很少和施明正聯絡，彼此說不上話，不同道。

其實，施明正寫〈喝尿者〉、〈渴死者〉兩篇作品時，便決定奮力一搏，豁出去了。這兩篇作品明顯逾越了戒嚴時代的政治紅線，它奮力扭轉（從統治者的立場則是扭曲）了政治犯的形象，也顛覆了威權統治的權威。〈喝尿者〉描寫一個以舉發他人為「匪諜」為「常業」的「金門陳」，遭到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遭他人檢舉為匪諜，進了政治犯的牢房。在偵訊時遭到刑求逼供、被打成內傷，得不到醫療，獄友告訴他的偏方是——每天早上定時有恆地把自己解的小便喝下去，是治癒遭毆擊內傷的好療法。金門陳沒有其他方法可想，為了療傷延命，只好乖乖地喝尿。獄友告訴他的偏方，不是作弄他，或許還真的有效，早年也有日本人研究尿療法。但世俗對於吃屎喝尿有一定的觀感價值，總是認為那不是人應有的正常行為，簡單地說，那不是人所當為，只有無知的畜牲才會屎尿和食物不分。金門陳的遭遇雖不是特務走狗的通例，然而人人恨之入骨，是個不知多少人、多少家庭受其無故傷害、摧殘的惡人，得此惡報，總是天道好還。施明正以此嘲弄金門陳，也在嘲諷白色恐怖統治的荒謬。

〈渴死者〉是寫一個在宜蘭任職的軍訓教官，跑到臺北火車站喊「共產黨萬歲！」「毛澤東萬歲！」之類的反動口號被捕，不但無一語為自己辯護，反而一心求死，請軍法官趕快判他死刑，並且等不及法庭宣判，就一再求死。先是預藏了十幾個早餐的饅頭乾硬之後，一口氣塞進肚裡，再猛灌自來水，企圖脹死自己不果，撞牆自殺也不成功，最後還是乘人不備，以褲管在囚房欄杆吊死自己。戒嚴時代的白色恐怖總是以死刑、死罪威脅人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渴死者〉一樣也在挑釁白色恐怖可笑的荒謬。

另外兩篇〈島嶼的蟹〉及〈指導官與我〉，也和白色恐怖經驗有關。

「島」是寫他的第三任妻子執意要和年齡相差二十五歲的施明正結婚，央請好友Long（許晴富）夫妻到王順慧家作媒不成，而述及Long的長年往事、情誼。許晴富原名許聰敏，美麗島事件後，因共同藏匿施明德，被軍事法庭判有期徒刑七年。Long和施明正是海軍服役時電訊班認識的五虎將之一，一起參加國慶閱兵，得到冠軍，是施明正最心儀的對象，是內外都美的「賭神」級人物，一生都活得瀟灑。

〈指導官與我〉寫臺灣的知識分子甘為特務，一輩子替統治者當鷹犬、獵殺人民。指導官是施明正在海軍服役時的指導官，即政戰官，因為和施明正爭勞軍康樂隊女軍官落居下風而懷恨，寫了施的黑資料，導致施被捕後，影響他的判刑。不意事隔多年，施在臺北開設推拿中心，施明德在美麗島事件後下落不明，指導官又以情治人員之身分，陰魂不散地找上門來，也因而讓他想起，他因案入獄時，完全就是某些臺灣人的大頭病，落入特務的圈套，像狗一樣咬來咬去，害人又害己。

施明正這四篇與白色恐怖時代牢獄相關的小說，或許都有真實的事蹟、人物可本，重點在於作者不顧自己「前政治犯」以及政治重犯家屬之身分，明知特務已找上門了，仍不顧一切要奮力揮擊。或許他在這個時間點上，已做出犧牲自己的準備，和他最後的絕食抗議至死方休一樣，是在完成他人生美學的最終章。

臺灣悲歌，生命悍士 ——詮釋與凝視施明正與施明德獄中書寫

黃文成／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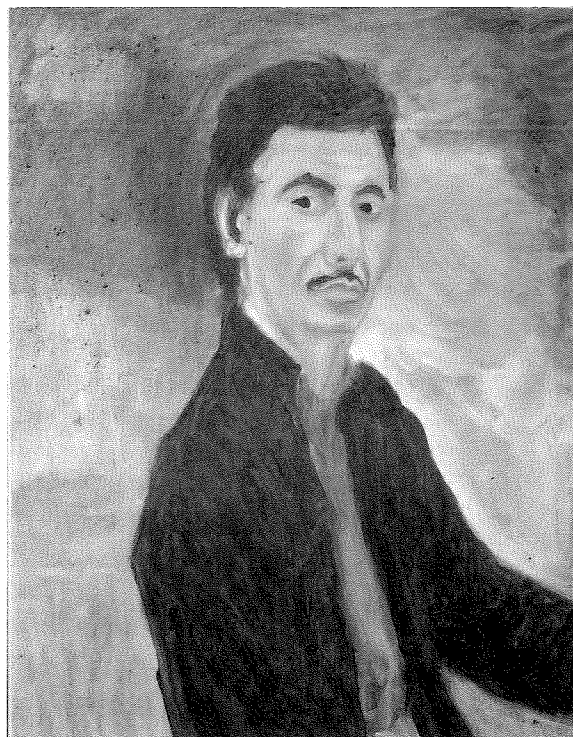
施明正獄中書寫

無疑地，站在時間的洪流裡，我們正在重構所謂的「歷史」，但何謂「真實的歷史」？不得不透過親臨歷史現場人士的經驗與想像，來重建另一種真實與虛構相互依存與記憶的歷史情境，尤其經歷過歷史現場的真實後創作下的文學，特別具有意義。於是我們在監獄文學的裡層，看見政治時代推移的痕跡；這一張牙舞爪的痕跡，使得施家兄弟的生命軌跡朝向兩端發展——「靈魂的自由」與「理性思辨」來證明生命存在的價值。而對於獄中文學心靈地圖描繪，施明正¹顯然是用五官來拼湊一個在黑暗國度「魔鬼自畫像」的靈魂圖騰。

施明正（1935～1988），臺灣高雄人，是臺灣政治發展史上，以絕食對抗政權致死的第一人。1962年因「亞細亞聯盟案」被關入獄的施明正，先是關在臺北青島東路，後轉往臺東泰源監獄；在獄中開始嘗試寫作，並投稿於《臺灣文藝》。在獄中從事創作的〈渴死者〉與〈喝尿者〉兩篇小說作品，可說是臺灣監獄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

一、魔性的現身與神性的獻身

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在《失卻家園的人》談到：知識分子是一個科學家或藝術家（包括作家），他們不僅僅從事科學或藝術創作活動，進而為真理的探索與進步做出貢獻，而且關心公共利益，關心社會價值準則的



施明正，是臺灣政治發展史上，以絕食對抗政權致死的第一人。圖為施明正所繪之自畫像，《施明正詩畫集》一書之封底。（圖片提供／楊菁）

演變，因此積極參與有關價值準則的討論。²他又進一步地指出美國哲人、社會學家克利斯朵夫·拉什（Christopher Lash）理論，說明知識分子有三種職能，與歷史上的三個歷史階段大致對應：良知的代言人、理性的代言人、想像力的代言人。第一種情況下，知識分子是道德家，他們以傳統與宗教為依據；這是最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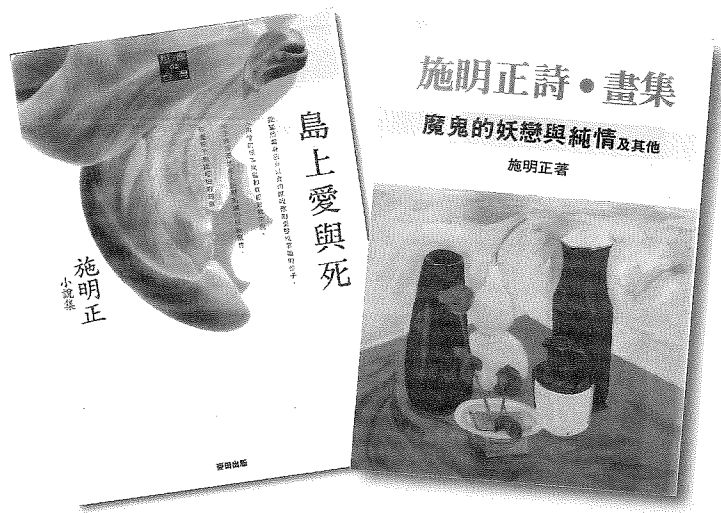
老的知識分子類型。第二種情況與第一種情況相反，它出現在啟蒙運動時期，這裡，科學家成了最理想的人選。第三種情況是與後啟蒙主義的浪漫主義運動對應的，其代表是社會邊緣人、可詛咒的詩人和藝術家。每一類知識分子的旗幟都與眾不同，它們分別是：真、善、美。拉什並不掩飾他對第一種類型的偏愛，並且勸說我們在經歷啟蒙運動與浪漫主義徘徊期後回歸從前；他希望「恢復已半被遺忘的在公共場所進行道德演講的傳統，知識分子在演講中呼喚的是良知，而不是科學理性或解放自我的浪漫主義夢想。」³那麼，身為知識分子的施明正在這場政治恐怖歷史現場中，留下的文學作品，其所扮演的角色顯然正是克利斯朵夫·拉什所言的「想像力的代言人」。

而施明正的文學／獄中作品，自白的屬性甚是強烈；透過文本，讓作者的情緒完全地表露在讀者眼前，這種恐懼的真實，無所遁逃。〈渴死者〉第一段

1 施明德是美麗島事件最後遭到逮捕者，1980年被處無期徒刑。1988年國民黨公布減刑條例，施明德刑期減為十五年。但施認為美麗島事件是政治而非司法案件，必須重新審判，因此開始絕食抗議。他當時已在臺北三軍總醫院戒護就醫，數日後因體力衰竭，被強行灌食。4月20日施明正獲知施明德絕食情形，乃開始跟進聲援。見黃娟，〈政治與文學之間——論施明正《島上愛與死》〉，林瑞明、陳萬益主編，《施明正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3年），頁317-325。

2 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著，許鈞、侯永勝譯，《失卻家園的人·知識分子政治》（臺北：桂冠出版社，2004年），頁119。

3 茨維坦·托多洛夫著，許鈞、侯永勝譯，《失卻家園的人·知識分子政治》，頁120。



施明正的獄中小說，不斷召喚出時代下的悲劇英雄，透過一個悲劇的誕生，來終結生命困頓的命運。（圖片提供／楊菁）

小標——金屬哀鳴下的白鼠，寫盡這份在生命記憶底層無盡的無奈與難堪：

〈金屬哀鳴〉，鐫刻獄卒手裡一大串巨大鑰匙的碰擊聲、開鎖聲，以及劃過鐵柵欄，那跳躍，奔騰一如尖銳的彈頭破空擊向鐵柵欄，碎發的哀鳴，給人的恐懼和不安。這種聲音的恐怖，深沉在我的內心，久久無法消失。……雖然如此，如今，我在睡前，還要捏兩丸衛生紙塞住耳孔，以過濾、阻擋尖銳的聲響。⁴

求死，是為成就自己肉體的不堪及精神被虐的極致，換句話說，就是在瘋狂的境地，魔性的出現展現了瘋狂的一面：

忽然，一陣奔過木頭地板的腳步聲，和頭蓋骨撞上鐵柵欄的悶響傳了過來。我跟同房，還有對面柵欄裡的人，幾乎同時抬頭，尋找，而且馬上看到用腦袋當鼓，藉鐵柵敲鼓的他，正站在鐵柵前發楞，在他確定沒有把脖子上的鼓給敲破以後，頗為懊惱似地，雙手緊抓住鐵柵，像拉單槓，又像鬥牛場的牛猛烈地撞了起來。⁵

4 施明正，《島上愛與死——施明正小說集》（臺北：麥田出版，2003年4月），頁242。

5 施明正，《島上愛與死——施明正小說集》，頁245。

就像鬥牛一般撞向鐵柵，人至此精神徹底瘋狂；再來，便是步向死亡；而死亡的境地竟與涅槃精神狀態一般：

聽說，他的死法，非常離奇，……結在常人肚臍那麼高的鐵門把手中，如蹲如坐，雙腿伸直，屁股離地幾寸，執著而堅毅地把自己吊死。⁶

生命的終極處，竟以選擇渴望追求一死為唯一的嚮往。而這樣求死的勇氣，就是經過祈禱、經過恐懼後所產生的人性終極體現。自體的魔性現身，無疑地是為步向神性獻身的第一個步驟。

文學藝術之所以以悲為美，主要原因在於：悲能夠深入到自我心靈的最深層次，能夠使人意識到自己生命的真實存在。⁷ 施明正的獄中小說，不斷召喚出時代下的悲劇英雄，以悲劇英雄的肉身來不斷喚醒其內在的神性。此歷程就像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說的，渴望在書寫中尋找話語網眼的填補物，然而書寫同時亦是指出昇華之短暫、及生命之無情終結——人之死——的黑暗的魔力。⁸

文字中的瘋狂與惡魔，正是人性中被壓抑的恐懼對象之復出，一種真實的面貌。這是主體永遠畏懼的自身內在陰性成分，此陰性成分隨時可能會滿溢、氾濫而致失控。無意識中騷動而無名的欲力只有符號之後，才可能進入意識，被正面對待。

因此，透過文字與藝術的昇華，此無名欲力符號化而成為所謂的「陰性書寫」，我們便因此而能夠窺見主體所恐懼排斥的對象何在。⁹ 透過悲劇的書寫，進行靈魂的超越；透過一個悲劇的誕生，來終結生命困頓的命運。筆下的人物如此，現實情境的主角也是如此，渴死者／喝尿者／魔鬼／施明正，全是歷史運作下的受難悲劇性人物。施明正於〈指導官與我〉中，如此描繪這塊土地的

6 施明正，《島上愛與死——施明正小說集》，頁250。

7 彭鋒，《美學的意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頁86。

8 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著，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臺北：桂冠出版社，2003年5月），頁210。

9 克莉斯蒂娃著，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導讀：文化主體的「賤斥」〉。

受難圖：

當飛機在微雨豔日中，升上美麗寶島的上空，我邊畫著聖十字聖號，並以默禱沖散沖淡打從進入偵訊室至此一直緊箍著我全身的恐懼。並首次從空中俯瞰我的祖先受苦受難從幾百年前的荒蠻開拓得這麼漂亮，遠看很像我當時畫過的現代抽象表現主義帶著幾何構成的綠色系統完成過的油畫，卻還不得不讓他們的子孫活受烤爐煎熬獵人追捕的疆土。¹⁰

施明正以一個黨外政治受難者角度，看著臺灣這塊先民以鮮血生命掙來的土地，悲憫地藉宗教力量及方式進行禱告。大多數黨外人士都將臺灣獨立這個政治立場，視為是宗教信仰般的神聖。

二、糜糜魔性與自在神性

對於處在監獄的感受是怎樣情境？人的肉體在被禁錮過久，感官知覺似乎變得遲緩；但那僅止於肉體感官上的感受，精神的敏感性卻是越趨緊繃，施明正如此地描述獄中精神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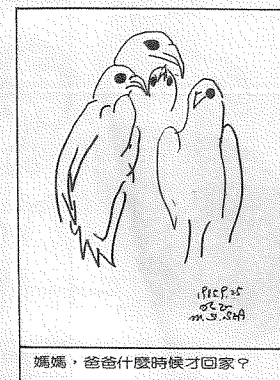
當你生活在一個絕對無法由你主宰的空間時，你會從逐漸學乖的體驗裡，形成某種樣品。由於人類異於其他生物，於是乎人類在多方思想、回憶，以適應生存的過程中，便自然地塑成了各種各樣的典型人格。¹¹

心靈自由與現實的困頓，施明正他自言：

這不能說不是命運在主宰人的航程？或是人的航程被暴風雨似的驚濤駭浪所干擾，因而被折騰、被試煉；假如每個人是一條船，那麼在完成其成為一條船的造船、試航中，豈能不把汪洋大海，那多變的季候、氣

10 施明正《島上愛與死——施明正小說集》，頁301。

11 施明正，《島上愛與死——施明正小說集》，頁242。



魔鬼的典獄長

我有一個典獄長，魔鬼說
我有一個典獄長，她是我的異性
我的典獄長是很精緻的
我想我的典獄長有著古代女皇之威
而無武則天的淫亂

慘了。魔鬼說

魔鬼又說：是這樣我才
免於被列入禁錮，免於死亡
不然她能儘吃冰棒香蕉或玉棒
而我僅能埋頭苦幹在一口井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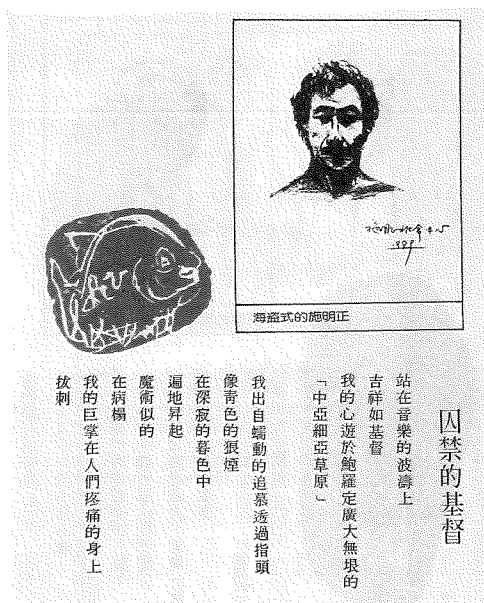
一九八四·一二·四·四時四二分

施明正總以「魔鬼」自喻，而他的詩也帶有魔幻現實主義的味道，蘊含一種魔力。圖為《施明正詩畫集》之內頁。（圖片提供／楊菁）

象，預先列入承受巨變震盪的力學結構之內。雖然人類承受巨變的能力，也像船隻一樣有其先天壽命的極限，這也許就是人類和船隻共同的脆弱性所呈現的悲劇，和無可奈何。然而歷史和史詩往往在記載並歌頌這些人在被折騰和試煉中，所表現的無比淒美、宏壯、堅毅、苦澀的悲劇性甘甜；就像苦瓜湯的去火，好茶的醒腦，和醇酒的振奮人心。¹²

施明正以極超越的人生觀轉化其生命的苦難處。歷史就像史詩般的壯闊，自己的生命一如一篇史詩，其中的磨難對自身而言，就像悲劇的主角上演他的角色，全心投入，一如苦瓜湯、好茶、醇酒，細細品嚐，沒有怨懟，只有堅持自身一路走來的道路。他也曾寫下這樣的文字：「我不喜歡政治，我從未就文學

12 施明正，《島上愛與死——施明正小說集》，頁202。



多才且多情致使其生命落入一個如神／魔之境的施明正，其生命充滿了神話式的格局。圖為《施明正詩畫集》之內頁。（圖片提供／楊菁）

作品與政治的因果，做過任何比較。我的一生，是注定要成為一個最純粹的文學藝術家。」但施明正的生命與獄中文學作品，卻演繹出臺灣監獄文學史中重要的一個主角。無論光影變化或是對生命中苦難的喟嘆，無處不是經典之作。

顯然地，以渴死或喝尿的方式求死，在精神上是求取一種生命的救贖，拋棄舊有的生命載體，因為人性在這場鬥爭當中已無法從真實的生活中尋求解脫。

施明正〈渴死者〉、〈喝尿者〉等篇的監獄小說，反映在獄中因現實生成的荒謬感，哈維爾（Václav Havel）對這樣的荒謬感，有極深刻的分析。他認為：荒謬感絕不是對生命的意義失去信仰的表現。恰恰相反，只有那些渴求存在意義的人，那些把意義當作自己存在不可分割的維度的人，才能夠體驗到缺乏意義的痛苦，更準確地說，只有他們才能透徹地感受到這份情感。在它的令人痛苦的缺失狀態中，意義反而獲得了更加逼人的存在——比不加質疑的簡單接受的存在更富於力度，就如同一位重病纏身的人比健康者更能體會到健康的意味是什麼一樣。

我相信，純粹的意義缺失與純粹的無信仰在面貌上是截然不同。冷漠、麻木不仁和自我放棄會把存在降低到植物水平上。換句話說：荒謬體驗與意義體

驗密不可分，只不過它是意義的正面，就像意義是荒謬的反面一樣。¹³〈喝尿者〉等監獄小說，亦透顯出施明正處在悲觀的客體環境還保有樂觀浪漫性格，如：「當然這種由直腸與肛門所發出的歌唱似的聲音，也像人們的喉嚨那樣，一聞其聲，便知其人了。」

多才且多情致使其生命落入一個如神／魔之境的施明正，其生命充滿了神話式的格局。林瑞明對於施明正的一生，有深入而明白的敘述，他說：

施明正少年時代即喜歡文學藝術，曾自言：「窮我十生，逃也逃不出深陷於如此迷人的文學藝術酒池那般，樂此不疲……」，但作為一個政治受害者，使他自認是「天生怕死」的人，每每需要以酒精麻醉自己；他的佯狂，其實含有自保之道。……施明正，這位自稱「魔性遠比神性多了三分之一」的現代傳奇者，於1988年8月22日因肺衰竭而死於醫院。當時他的四弟施明德正在長年監禁中又一次進行絕食抗議。¹⁴

生命若失去意義、目標、價值或理想，結果將引發極大的痛苦，嚴重的時候會使人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於是，我們可以認同施明正小說中所透顯出來的某些精神上的錯置感，其實是向現實索取精神自由的所有權。

王德威認為施明正的這種精神向度創作觀，是突出了色相的極致追求、主體的焦慮探索、文字美學的不斷試驗；一方面也透露了肉身孤絕的試煉、政教空間的壓抑，還有歷史逆境中種種不可思議的淚水和笑話。歷經了一生的顛撲，施明正彷彿終於要以自己決定的死亡完成他對現代主義的詮釋。¹⁵

施明德獄中書寫

施明德，臺南縣人，1941年生，曾任中華民國立法委員、民進黨黨主席。

13 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著，李永輝、張勇進、鄭鏡彤、陳生洛譯，《獄中書簡》（臺北：探索文化，1998年3月），頁122。

14 林瑞明，〈以生命撞擊藝術的「魔鬼」〉，《施明正集》，頁11-12。

15 王德威，〈島上愛與死——現代主義，臺灣，與施明正〉，《島上愛與死——施明正小說集》，頁14。

1962年因臺灣獨立事件判無期徒刑，1977年獲「減刑」，此次囚滿十五年出獄；然兩年後，又因美麗島事件被捕，再度被判無期徒刑。二次入獄服刑時間長達二十五年。二十五年的牢獄生活，對個人生命的一切，無論是人生觀抑或是價值觀，都絕對地會造成根本上的改變。施明德《囚室之春》散文作品，可謂是施明德二十五年牢獄生活的寫照，也反映出施明德的人生觀與價值觀。

但，也許施明德以生命來衝撞臺灣在六〇年代的極權統治制度，生命的底層對臺灣政局的未來，具有浪漫的嚮往，然我們就其文學作品來看，他的政治人性格與施明正的藝術家性格，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類型。施明德有位藝術家性格的兄長，然我們從施明德的文學作品中，可見其性格非其兄長的浪漫，而是傾向於理性思考下的風格。雖是親兄弟，然其對於入獄經驗的觀照，則是兩種完全不同典型的類別。

鍾肇政對於施明德的獄中書寫，相當肯定，尤其在閱讀過〈囚室之春——盆栽雜談〉一文後，鍾老對其生命與書寫經驗的深刻，專文述之。他說：

施明德是政治人物，這一點大概不會有人否認。一般印象，政治人物好像與文學風馬牛不相及，而施君在此篇裡表露出來的文學修養，在這個意義下便顯得那麼令人詫異、稱奇。不獨文采燦爛，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並且採的雖然是隨興之所至的隨筆風格，實則每個片片段段都隱然透露出精心設計之功，到了「妙手天成」的地步。想到他長達二十五星霜的沉潛內修，則又覺得這也不足為奇了。¹⁶

以下，便就施明德在獄中書寫之內容，做一深入的閱讀與詮釋。

一、理性之內、感性之外的囚犯哲學

施明德自剖入獄以來的心境，自嘲二十五年來囚犯經驗已能規範出一套生存哲學，以供參考。大抵他的「囚犯哲學」由三項觀點組成：



施明德的理性性格，與其兄長施明正的浪漫藝術家性格截然不同。圖由左至右為施明德、陳菊、陳鼓應、艾琳達。（圖片提供／艾琳達）

第一、囚禁只是一種失去空間，換來時間的生活狀態。自由人的空間是廣闊的，原則上是包括了人類活動的全部空間。自由人雖能享有遼闊的空間，卻不得不為名、為利、為世俗雜務奔波，以致匆忙和時間不足便成現代自由人的共同感受。囚犯的空間固然是有限的、侷促的，有時甚至要孤單單的生活於一個小小押房裡，相對的，卻能擁有更多的時間來研究或思想自己真正喜愛的東西。這一點，是自由人有遼闊的空間，卻失去了時間；囚犯失去了空間，卻換來了時間。囚犯和自由人最大的差異之一，便是擁有時間與空間的不同。

第二、不要求環境適應自己，應該要求自己適應環境。囚犯的環境總是被決定或被支配的。該往何處，該與何人相處，該接受什麼生活條件，都不是自己所能強求的。……一名囚犯應該採取的心態反應之一，便是收斂自己的企圖心，使自己適應客觀的環境。唯有如此，才能在極度惡劣的環境下，免於身心的自我碎裂。

第三、接受「絕望」的意識。……一個囚犯如果任由「絕望」控制心

16 鍾肇政，〈「光」的追尋〉，《囚室之春》（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年12月），頁308。

靈，它就會腐蝕其意志，割傷其身軀，最後還會墮落地廉售其操節。¹⁷

由上述三個觀點，施明德的「囚犯哲學」的生成，是為抗拒「絕望」所延伸出的幾個重要理論，他進一步地述說：

根據第一點，我不把坐牢當作生命的休止或悲劇的延續。相反地，我認為這只是自己求知過程中的拉長與擴張，是強調時間萎縮空間的生活模式或生命的表現方式。根據第二點，我對自己以外的人、事、物、時、地等等，放棄任何改變的慾念，竭力要求自己去適應環境，以求得一個和諧的平衡狀態。根據第三點，我不因身受「終身監禁」的宣判而沮喪、迷失、墮落，反而唯恐「絕望」的構成情勢或條件驟然變遷，卒使計畫的課題無法完成。在這種心態下，「絕望」不僅不再是猙獰的腐蝕物，還是一股內在的催促力。¹⁸

顯然獄中的施明德對於生命是傾向於理性的思辨，而與其兄施明正感性抒發，極其不同。即使是〈囚室之春〉一文中，對於充滿生命力的花朵，也是以理性的態度來剖析：

坐牢，常常得靠追憶往事來確定自己曾經「活過」。但，回憶也像兩刃刀，解剖了「過去」，也把「現在」割得鮮血淋淋。¹⁹

客觀的環境，與主觀的生命情境，在凝固的時空裡，產生「鏡相」現象，主觀的情緒會投射在客觀的場域之中，這種主客情感的相互投射，其實就是「美的歷程」：

17 施明德，〈我的囚犯哲學〉，《囚室之春》，頁101-102。

18 施明德，〈我的囚犯哲學〉，《囚室之春》，頁103。

19 施明德，〈囚室之春〉，《囚室之春》，頁27。

真理是存在的真理。美不出現在真理之外。當真理自行置入作品時，美就出現。顯然，作為藝術作品中真理的這種存在的顯現，作為作品的顯現，這就是美。²⁰

與其兄的獄中文學相較，兩兄弟的獄中文學，剛好呈現兩種完全不同典型的風格，施明德的「政治人的藝文性格」與施明正「藝文人的政治性格」都落實在他們的文字作品中。

二、信仰的存有與信心存在的自我辯證

施明德在〈我的囚犯哲學〉中言及：「我曾經是一個被判處終身監禁的政治犯。套一句我家人的戲語：『是一個在圓圈裡奔跑，只有起點，永遠看不到終點的人。』」²¹ 二次入獄，皆獲判無期徒刑，而因政治入獄的政治犯或良心犯，面對未來，只有苦難的等待。

面對未來的虛無，囚犯的精神世界，有著兩種不同力量的展現與趨向，一方面是精神上的昇華與超脫，另一方面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流洩出人性的脆弱感，這兩種力量的拉扯，在施明德《囚室之春》中深刻且露骨地展現了出來。他說：「沒有光，植物很難生存下去；沒有光，人會活得不像人。」²² 生命的被壓制與扭曲，施明德以豆芽來形容在獄中監獄的生命狀態，是如何的堅強，但同時也是如何的脆弱。他這樣說：

最上層和外緣的豆芽，它們有較空曠和舒適的環境，任其自由生長，沒有重大的負荷來刺激它們培育更大更強的生命力。在整個生長過程中，它們可以說是順遂而沒遭遇挑戰的。但是，那些被困在最內層的豆芽，它們的空間擁擠、有限，又必須承受來自上層和四周的同類所加之於它們的壓力和擠迫；同時，它們又不像上層和外緣的豆芽那樣，可以輕易

20 李醒塵，《西方美學史教程》（臺北：淑馨出版社，2000年），頁573。

21 施明德，〈我的囚犯哲學〉，《囚室之春》，頁100。

22 施明德，〈囚室之春〉，《囚室之春》，頁24。

的燈，是我路上的光。」不錯，光是生命誕生的延續所不可缺少的。²⁶

在監獄生涯中，施明德面對生命中的「光」，亦即是面對信仰中的「聖經」，生命中的「光」與信仰中的「聖經」，有了全面性的體現。

所以「光」不僅僅是陽光，更是上帝、信仰、臺灣以及我的總和：

我的光，不僅指太陽放射的紅、橙、黃、綠、藍、青、紫。

我的光，來自於對上帝的虔敬。

我的光，來自於對真理的信服。

我的光，來自於對人類普遍性追求民主、自由、人權及和平的信念。

我的光，來自於深信臺灣人民終必會拒絕一切非法統治的信心。

我的光，來自於我知道有所愛、也被愛。

我的光，來自於自信，從心智成熟後到沒有犯過法律上的罪（crime）和道德上的罪（sin）。²⁷

而具有魔性的施明正面對生命黑暗時光，也是向宗教求索生命的超越，他說：

我的右手又下意識地反射著畫聖十字聖號，並在心底默禱著，把自己，這正陷於狂濤中的孤舟那樣無依的命運，交給造物主，以減輕自覺的恐懼。我首次體會到宗教的實用價值，活生生最明確的例證，產生在我身上。一如鎮靜劑之在精神病患者身上所產生的效果。我變得不那麼可笑。那是我羞於看到人露出的狼狽。²⁸

生命處在一個封閉的空間，虛無感是日漸壯大，存在的意義是日趨衰敗，施明德以「旋轉籠中的松鼠」為當下政治極權與自我生命情境做了一個極為精妙的

譬喻：

在我研讀存在主義，看卡繆的《薛西佛思的神話》時，我不禁想起那隻拚命的踩著旋轉籠中的松鼠。牠日夜不斷地在籠中做徒勞無功、周而復始的奔跑，不正是活生生的薛西佛思？牠可能以為快跑，便能逃出旋轉籠。但，當牠精疲力竭地停下來時，發現自己仍然在原來的地方，牠的恐懼感和絕望感以及命運的徬徨、淒涼與無助，可能更甚於薛西佛思。²⁹

「旋轉籠」其實就是牢獄空間，就是政治極權下的大環境，而周而復始地相信只要往前踩踏的「松鼠」，則是「童真的自我」。在童真的自我與現實情境的碰撞，施明德為自己的生命情境，提出了質問，這樣的質問，對自己而言，是一件嚴峻的考驗，一旦未通過自我質問，精神層面將無所遁從而至崩潰並不無可能。但同樣地，這樣的省思，亦帶給他精神的超脫，他自言這樣的思考下，產生兩種力量：一是形成「拒絕絕望」的信念；二是補強其人道主義的信念。前者「拒絕絕望」的信念，是種積極面的啟發，後者是強化施明德對於自己走向人群的信念。

長期關注臺灣政治與文學發展的陳芳明，對施明德的從政之路，有相當的肯定，他說：

在獄中，他以不合作主義，與劊子手堅定對抗到底。國民黨能夠監禁他的肉體與歲月，卻難以監禁他的行動與思考。基於政治良心與冷靜觀察，施明德是最早提出國會改革的主張，也是早期對臺灣國家體制改造從事深刻思考的先驅者之一。

在獄外，他積極參與本土性、草根性的民主運動，結合全島有志匯成七〇年代末期波瀾狀闊的政治風潮。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施明德再度入獄。然而，他絲毫沒有改變他對臺灣民主的信心。他從事絕食行動，他提出政治主張，仍然對臺灣社會產生巨大衝擊。

26 施明德，〈囚室之春〉，《囚室之春》，頁66。

27 施明德，〈囚室之春〉，《囚室之春》，頁66。

28 施明正，《島上愛與死——施明正小說集》，頁309。

29 施明德，〈囚室之春〉，《囚室之春》，頁79。



此圖為艾琳達所繪的「驕傲的公雞」施明德，標題那五字為施明德親筆所寫。（圖片提供／艾琳達）

四十餘年來，施明德已經成為臺灣民主運動的重要象徵。他的思考，他的行動，必然繼續走在時代、社會之前。³⁰

施明德身為臺灣政治的先行與預言者，卻讓他的青春在獄中度過。他在獄中的日子，一如陳萬益教授所言：「施明德也就是在自述囚禁歲月中承受苦難，抗拒誘惑因而護持生命尊嚴，旺盛自我生機的體驗中，得出哲理式的論點：囚室中的盆栽，沒有陽光難以生存，『囚室之春』則存在於人的心靈，因為他心中另有『光』——無所不在的信仰的光。」³¹

《囚室之春》一書的書寫，是施明德用生命向統治者的一項宣戰／宣揚，

30 陳芳明，〈民主先驅——施明德〉，《囚室之春》，頁316。

31 陳萬益，〈囚禁的歲月〉，《于無聲處聽驚雷》（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頁64。



施明德（其排左二）的大半青春都在獄中度過，因而得出哲理式的生存論點。圖為「美麗島雜誌社」於1979年成立時，社員在大廈門口合照。（圖片提供／艾琳達）

他說：「我可以失敗，但不可以失格。」³² 政治上懲戒的力量，在施明德的身上，又看到一次失敗的例子。

32 施明德，〈囚室之春〉，《囚室之春》，頁68。

作者簡介

黃文成，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為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研究面向包含臺灣文學史、文學理論、臺灣監獄文學等方面，發表多篇研究論文，著有《紅色水印》、《關不住的繆思——臺灣監獄文學縱橫論》等書，曾獲文建會青年文學獎、國家文藝基金會創作補助等獎項。